

“一带一路”的经济哲学追问^{*}

王程 周丽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用哲学追问当代经济热点,是哲学在场性以思想追问的形式去实现历史脱域性进步的重要显现。“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理论与实践不断牵引的结果,它至少蕴含三点经济哲学思想:资本空间逻辑的合理运用;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双向追问;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当代实现。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资本 “和合”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82(2015)10-0030-05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业绩,但改革远未达到完成时,它需要实践的不断牵引,更需要先进思想的指引。在此背景之下,2013年底,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国家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用哲学追问当代经济热点,是哲学在场性以思想追问的形式去实现历史脱域性进步的重要显现。

一、资本空间逻辑的合理运用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维度。唯物史观视阈中的空间生产体现了生产力不断进步与交往关系不断丰富的交互作用。资本的空间扩张由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所决定。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马克思,2009)。当代资本不断冲破空间壁垒,以吞噬空间和征服空间作为实现其增殖的客观载体,因此,空间生产不仅仍是当代资本扩张的一个基本途径,更成为当代资本嬗变存续的主导历史形态。

1. 马克思资本空间理论的三个维度

资本的空间理论起始于马克思,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出“空间”概念,但其“空间性”的向度为后来学者研究资本提供一条重要径路。马克思为该领域研究提供

了三条学术原理:

(1)资本空间扩张的二重性。《共产党宣言》中这段经典论述成为资本空间理论的完整表达:“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2009)。这段话启示我们:资本以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开拓为手段,不断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加以重构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在获得霸权地位的同时还侵吞人类的文明寓所,在攫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资本逻辑渗入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中。由此可见,资本在空间内追求两个维度的扩张:一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2)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同构。资本的空间化是指资本在三个维度的空间内吸收能量,追求无限增值。一是自然空间,资本大量通过物质质料在自然空间内重组创造出产品,通过市场交换体系转化为商品,一方面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另一方面带来了生态危机;二是资本通过吸收人的劳动力,不断创造剩余价值,一方面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积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困的累积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三是资本通过巨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将人群进行分工和重组,吸收社会组织的力量,一方面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的空间化在量上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导致空间的资本

^{*}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项目“民族复兴中国梦”、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项目编号:CXJJ-2014-426)的研究成果之一。

化,一切空间要素都被吸纳到资本逻辑中,资本宰制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因此,在资本的对象化空间中,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被剥夺了,一切资源被翻转为资本、一切关系被翻转为市场交换关系、一切价值被翻转为交换价值、一切人被翻转为理性经济人,货币成了“有形的神灵”,导致人类“物化——异化——幻化”的生存格律。

(3)资本空间化蕴含着人类解放之维。将资本丢入历史甬道中可以发现,资本并非永恒的范畴,人类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将资本带到人间,资本的背后是人的主体性存在,资本在运行中不断地扩张、嬗变乃至脱域的实质是人类精神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癫狂状态,可悲的是,它越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人类越是发现自身已被紧紧包裹在资本的牢笼里。正因如此,对资本的扬弃正是人类实现完全自由的必经过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辩证而深刻的,一方面看到了资本的空间化过程对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基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批判资本。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既是资本扩张的动力又是资本最后走向消亡的根源。

2. 国际资本主义新变化与空间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宁、布哈林、卢森堡等人沿着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阶段逐渐取代工业资本这条线索向前开掘,明确提出了空间性是西方殖民体系的重要特征,指出金融资本的出现将资本空间扩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个空间是由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结构的主导地位,欠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积累的外部空间。20世纪中期以后,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深入地发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列斐伏尔认为,当代空间生产已把物品的生产转变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空间并在整个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勒菲弗,2008)因此,资本主义的矛盾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加以解决。哈维则提出了著名的“时空压缩”概念:“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放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向我们崩溃了”(戴尔·哈维,2003)。在《新帝国主义》中,他通过“时空修复论”指出资本的空间性不仅是外延的更是内涵的,资本主义通过空间扩张不断庞大自身,过度积累,一方面导致了空间发展的

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这种不断被压缩的空间产生了强大的“空间动能”,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巨大动力。

3. “一带一路”与资本空间逻辑的合理运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对资本的利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仍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资本的丰富智慧:采用移除具有独特资本主义性质的历史印记,吸取为时代所同有的物质内容,即有关生产力和资本的巨大推动力的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定,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具体体现为三层含义:

(1)对空间与发展关系的辩证理解。空间和发展是硬币的两个面,空间是量度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空间赋予发展以现实性,任何发展的理念都要对象化到现实的空间内。“一带一路”利用了资本扩张时带来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的流动,最大化整合一切优势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产生双向激活的效应:一方面,“一带一路”主要针对亚欧大陆,这个空间内的国家普遍存在资源丰富,但长期得不到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局面,经济发展欠缺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积累,在资金、技术储备上已具备较大的国际竞争力,但当下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投资利用率不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土地要素难以真正在市场上激活等问题,中国迫切需要借助全球化进程,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将国内的比较优势真正加以激活,实现新的腾飞。因此,“一带一路”总体思路就是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借助资本在这个特定空间内产生强大的“空间动能”,通过空间重组将各国的优势资本与经济带内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通过优化设计、适度开发、合理使用和科学改造等方式加以整合重构,在激活亚欧大陆经济圈的同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体系。

(2)信息时代背景下对资本扩张路径的合理利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纬线,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型都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交往形式的重大转变。信息时代给人类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资本在时空中扩张和重组的速率成几何倍数增长,历史转型期也给资本的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径路。“一带一路”

在实施过程中抓住了四条路径:现代产业链、现代金融链、现代贸易链、现代文化链。通过现代产业链构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产业价值链;通过现代金融链为金融资本全球性流动与配置创造更广阔的空间;通过现代贸易链加速建立更为完善的多边贸易体系,减少因利益诉求的分歧造成的贸易壁垒;通过现代文化链加强各国的沟通与协作,营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环境。因此,这个四个途径不但能够迅速激活特定空间的资本,更能带动全球资本集聚,将世界各国的资本工具在特定空间内叠加,产生巨大的经济发展势能,形成先进技术共同研发、优势资源共享的新格局。

(3)体现出驾驭和导控资本的新思维。资本的禀赋是追求最大化的增殖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从资本的自身角度分析,剩余价值是目的,经济发展是手段,因此,如果不对资本进行驾驭与导控就会带来资本逻辑的恶果甚至造成新霸权主义。“一带一路”所最追求的目的是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实现,因而对资本的驾驭与导控的根本思路就是将目的与手段加以倒置,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目的,剩余价值成为手段。“一带一路”体现的正是这种崭新的思维模式:将资本权力的位格置于国家主权之下,用各国国家意志的合力驯服资本的强权,把资本的负效应降到最低,使资本运行的轨迹始终处在为实现人的目的服务的价值判断中。在《愿景与行动》中具体体现为各国无论大小、无论实力强弱,在国家主权层面一律平等,在此原则下,承认和尊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各国借助信息化时代普遍交往的历史性机遇平等地享有发展和道路选择的自主权,承担不同的义务,实现各国最大化的发展。

二、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双向追问

资本空间逻辑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空间内形成资本权力场,空间由资本运行的媒介转化为实践权力的场域,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由异构走向同构,两种权力的共同目的在于为资本进一步增殖提供条件,资本完成了脱域性嬗变,成为宰制政治权力和精神寓所的巨大客观力量。

1. 资本与权力关系的演绎

资本自诞生时就与政治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权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空间内为资本增殖开辟道路,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打破国内商业壁垒,为资本积累提供便利。二是

国家权力为资本开拓海外市场和建立殖民地提供强大的军事支持。三是借助“法律面前平等”的观念为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提供合法性保障。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确立之后,资本权力不断地伸向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共同支配社会关系,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呈现如下交织与对抗的辩证关系:一是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一方面,政治权力直接在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政治权力转化为资本,这种方式极易引发权力的“寻租”。当这种现象达到普遍时就会导致利益集团的产生,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本日益的壮大必然导致其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进一步增殖开辟新的道路,资本主体通过经济权力渗透到政治权力中,成为左右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当代,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企盼激活资源与作为资本主体的企业企盼资本最大化增殖的二律背反。二是权力主体与资本主体的相互转化:一方面,政治权力主体嬗变为经济领域的主体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最为强势的一方;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渗透到政治领域,资本主体对政府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资本主体就成为了政治的“幕后人”。三是资本权力与世界权力的相互转换。世界市场形成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生产关系,资本权力也成为了一种世界权力,表现为发达国家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消费,使其国内市场服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志和政治权力。

2. “一带一路”新思维对资本与权力关系的两个追问

关于“一带一路”中的资本与权力问题,必须经过深层次的反思。如果将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剥离成两个不能发生任何关系的范畴,与其说是一种理想的预设,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编织的谎言,目的在于证明资本的“纯洁”与政治的“公正”。因此,对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思考应体现为如何将二者锁定在正确的运行轨道中,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规制对方的消极影响。

其一,“一带一路”中的国家即是经济主体又是政治主体,这里包含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经济主体的国家以资本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国家之间是经济上平等的主体,相当于市场经济

中的“法人”,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中的经济主体不仅是国家,也包括国家中的个人和企业,这时的国家又作为政治主体隐藏在个人和企业体身后,体现出强大的政治权力保护作用。

在这个向度的追问中,体现了中国将“无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之外交思维即“万隆精神”完整地贯彻在经济交往中。各国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根据真实的主体意志按照市场法则进行交易,依据自身的需要和特点平等而有效率地完成了资源配置,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这是与强权式捆绑交易和强迫交易截然相反的思维范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层把握,并将之运用到国际领域;在对企业和个人的保护方面又体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资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起着盾牌的作用,目的在于维护这个空间内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不是直接将政治权力转化为资本进行强行地输出。因此,在这一追问里可以厘清这样一条思路: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在各自的轨道中运行,“一显一隐”,目的在于相互补充,相互规制,健康运行。

其二,国家意志如何在“一带一路”中实现?正如人有人的意志存在一样,国家也有国家的意志存在,“一带一路”中国家虽然作为经济主体而存在,但背后必定包含了国家意志,这种国家意志必定与他国的意志在交融中汇合碰撞形成意志合力。而各国的个人和企业也广泛地融入到他国的经济领域,对他国的政治权力也会产生影响,这些不同层次权力共同形成了复杂的权力结构体系,使这个复杂的权力结构形成强大的合力。

在第二个向度的追问中,体现的是历史的目的性原则。“一带一路”的最终目的是推进世界历史进步,这既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意志。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的进步最终要依赖生产力和交往这两条经纬线,“一带一路”正是将这两条经纬线完整地加以贯彻。各国与各国的交往,企业与国家的交往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既有助于各国在普遍的交往中吸纳他国的经验充实到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生产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打破固有利益集团的权力堡垒,在融合之中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型体系。

通过上述两个追问,我们可以发现,“一带一路”的提出从一个全新的高度理解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它最大化地利用了资本与权力互动带来的正面效

应,又通过利用资本和权力的特点使二者做到相互规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程度。

三、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当代实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遵循“丛林”法则,体现为竞争、掠夺、弱肉强食。近代以来,资本不但掠夺生态资源,更对人类的精神寓所的侵蚀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当代,西方强国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将基于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招牌,打着拯救人类的口号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行或者隐蔽地输入到不发达国家,使其不但在经济体系上受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宰制,更在精神领域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奴役、在政治领域受西方政权的统摄。而“一带一路”不管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以中国古代“和合”思想加以贯通,无论是资本空间理论的合理运用还是资本与权力关系的互动,都以这个思想作为灵魂加以贯穿,这是区别任何一种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合作机制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 “和合”思想的主要内涵与时代价值

“和合”思想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旨趣所在。《易经》里“和”字为和谐、亲和之意,到了《尚书》中体现为对社会关系矛盾的处理;“合”则指符合、相合的意思。《淮南子》中有云:“阴阳和合万物生”,其中蕴含着最根本的宇宙生命意识。经过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绵延,“和合”思想至少体现出以下三点内涵:一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包容世间万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异质化,认为世间万物诸多的差异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的一个整体。二是追求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无论在社会关系还是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都应平衡地化解矛盾。在实践中体现为“持其两端而用其中”,把“中正”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以此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三是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维: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合”中的“阴”和“阳”的转换就是事物生成、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曾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马克思,2009)

当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冲突与对立。“和合”思想的介入对于缓解现代性二律背反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其一,整体性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寻求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动力。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

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导致主体永远处于支配客体的状态,在这种思维范式的指引下,人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国家和民族成为原子式的群体,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割裂的和对抗的。而“和合”思想视域下的世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各民族和各国家都是这个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矛盾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因此,在交往中变拒斥矛盾、暴力解决矛盾为转化矛盾,在交流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这是处理问题的总体思路。其二,有助于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多元化价值观背景下寻求一条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准则,这个价值准则就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承认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异质的基础上,增强各文明之间的认同感,把各种文化看成人類文明的共同组成部分,开展各种对话、交流与合作。其三,在行为准则上将“中庸和谐”贯彻到各国的交往实践中,在解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矛盾时力求不偏不倚,兼顾各方利益,把动乱冲突转变为平衡和谐地解决问题,有效地化解全球化所引发的危机。

2. “一带一路”与“和合”思想的当代实现

“一带一路”不但体现了中国“和合”思想的精华,更会在实施过程中将“和合”思想广传到世界各地,建立起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彰显中国精神独有的魅力。

第一,联系发展的辩证视野。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主导下的西方经济学善用现代理性主义科学思维方式进行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被看成由一系列客观存在者组成的因果链条,解决矛盾的方式是简单粗暴的。而“一带一路”体现的正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愿景与行动》深刻地体现了“和合”的辩证法意蕴:当代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差异性、异质化的因素构建的有机整体,各国在发展中产生矛盾是正常现象,解决矛盾的过程应采纳“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矛盾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催生新的动力,各国的经济、文化更为紧密地融合到一起,经济才能充满活力,文化才能保持创新,从“求同存异”不断地向“聚同化异”靠拢。“一带一路”的实施给了各国融入世界经济一把钥匙,成为各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第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发展意识。《愿景

与行动》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代的主题词,这里蕴含了在和平与合作中实现共赢的深刻内涵:一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消融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变掠夺性利用为保护性开发,通过技术的进步把资本运行的方式由原来量的膨胀优化为质的提升,不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人的生存空间,导致代际不平等、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二是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体现尊重理解、和平共处的包容姿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尊重各国的文明与政治制度模式,不因谋求自身利益而将意识形态强加别国甚至控制、干预别国的政治和经济运行。

第三,合作对话、共同发展的行为模式。传统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多是“规则——服从”的格局,由一个或几个强国担任领导制定游戏规则,其他国家若要参与必须服从游戏规则,强国通过经济和军事实力既充当保护伞又将成员纳入统一支配的体系之中,造成了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而《愿景与行动》则将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根本宗旨,并提出“政策沟通”的重要性,“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以合作精神共同制定行为规则、共同应对经济风险、共享经济利益、把实现共同发展作为总体目标内化为各国的自觉行动,通过平等交流不断地缓解现代化带来的紧张与冲突。这种行为模式必然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卷、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勒菲弗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戴尔·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李斯特著、陈万旭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 作者简介:王程、周丽,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吴群]